

青年读本

曹湜题



文学人生

(下)

茅盾著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汉族，浙江嘉兴桐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

大众文艺出版社

青年读本

黄方道题



中青院 11 000646173



文学人生

(下)

茅盾 著

延安行^①（节录）

1940年5月6日下午三时许，苏联的交通班机降落在兰州飞机场。张元夫从新疆土产公司要来一辆旅行车，把我们送到南门外中国旅行社兰州招待所，说好次晨六点来车接我们去飞机场，飞往重庆。

招待所的经理是老相识了，他殷勤地为我们打开楼上的三间客房。阔别一年，招待所依然如故，客人不多，也没有新的建筑。经理解释说：自从你们走后，兰州就连遭轰炸，只要到城里走走就能见到满目疮痍。我们这里还算幸运，炸弹没有光顾；这一年我们能保住这点家当就是大吉了，哪顾得上扩建。

坐了一天飞机，大家都感到疲倦了。我们早早吃罢晚饭，正准备休息，张元夫忽然跑来说：刚刚得到通知，有位政府大员要搭我们这架飞机去重庆公干，他的随员很多，座位不够，要我们让出几个来。没有办法，只好来同二位商量，你们能否迟走几天，搭下一班飞机去重庆？我问：“那位大员是谁？”“是从绥远来的傅作义将军。”“他怎么会知道我们这架飞机是飞重庆的？”“这个，这个，他们自然消息灵通。”张元夫吞吞吐吐地说。我心中不禁冷笑：才飞出新疆，我们的“身价”在张元夫的眼里就变了。于是说：“仲实是

① 本章最初发表于1985年2月《新文学史料》第一册（总第二十六期）原题为《延安行——回忆录[二十六]》，后编入《我走过的道路》（下）时删去副题。



单身一人，飞机上不会只缺他一个位子，我们一家可以留下。”仲实却连忙推让：“不，不，我还是和沈先生一起行动。”张元夫还要噜苏，我说：“张先生不必解释了，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又无公干在身，早走迟走无所谓。只是要麻烦您通知新疆土产公司一声，明天把飞机上我们的行李送到这里来。”

张元夫走后，德沚嗔怪仲实不该谦让，“张先生太老实了，你这一让让掉一张飞机票，只好自己掏腰包了。”仲实说：“我原来就不想去重庆，现在你们都留在兰州，我一个人更不想去了。”仲实告诉我，他想去延安，在迪化就问过孟一鸣，孟告诉他，到了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就行。仲实劝我们也去延安看看。

当天夜里我和德沚商量，决定到了西安再定，如交通方便，就与仲实同去延安，两个孩子也可以进延安的抗大、陕公学习。

第二天，我们向经理打听去西安有什么交通工具。他说有航空班机，但票很难买，没有硬牌子，等两三个月不算稀奇；现在一般人都乘长途汽车，只是路上辛苦一点。经理又告诉我，西北公路局局长仍旧是一年前那位沈局长。我和仲实商量，决定先到生活书店兰州分店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有没有便车，再作道理。我们找到了薛迪畅，他告诉我们，一年来政治形势大大恶化了。由于国民党的压迫，生活书店各分店有的被查封，有的不得不停业，兰州分店也已经撤销。他正准备离开兰州去重庆，也在等交通工具。

薛迪畅又向我们介绍了一年来兰州的变化。

我们从兰州招待所进城，一路上已见到了这种变化：几乎每一条街都被炸，许多商店只剩个门面，中山市场成了废墟。然而几条主要的街道却拓宽了，临街盖起了一排排平房，新开了各种商店，其中以出售日用品的百货店为最多。这些商店都有簇新的门面，醒目的美术字招牌，甚至还有玻璃柜台。柜台里陈列着花花绿绿的日用品。一年前奇缺的肥皂、毛巾、玻璃杯、自来水笔，现在已琳琅



满目，甚至人造丝袜、吊袜带、领带等奢侈品也应有尽有，货源充足。除了新开张的洋货铺子，还有沿街步哨似的地摊，上面虽有些土货，但大部分也是洋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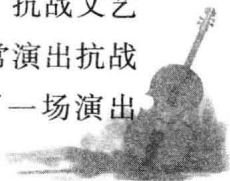
然而这些洋货是从哪里来的呢？看看商标是地道的国货，但内地的轻工业工厂能制造出这些东西来吗？不久，从公路局的沈局长那里了解到了内幕，原来洋货充斥市场，除了“工合”有一部分成绩，主要的是走私。所谓走私是指从敌占区将货物偷运出来。做这种生意是犯法的，因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资敌行为。

可是这些走私货，当初却是堂堂正正沿着西兰公路运进来的，有用军用大卡车运，也有用胶轮骡马大车拉（一辆大车能拉三千斤）。据说做这种生意是军方的特权，一般人无缘染指——不经军方同意，私货休想安然通过前线。至于长途贩运，又有官商一体的庞大严密的组织，既有包运的，也有包销的，更有许多居间作桥梁的“两栖动物”，在路上有武装保护，到了地头，又有虎头牌撑腰。所以，虽然关山万重，稽查严密，这些私货都能安然无恙地送进大商店的仓库，而且打开一看，已赫然“化私为公”，贴上了国货商标。

还有另一路的走私货，那是些为博取蝇头之利以糊口的“私贩子”，凭着双肩和两腿，从私货的聚散点贩上小小一担货物，肩挑背驮，抄小路，绕关卡，好不容易弄到兰州。销这一类走私货的，主要是兰州街头的摊贩，而沿途关卡稽查的对象也正是这些穷昏了的私贩子。

这就是1940年春兰州居然出现了战时繁荣的原因之一。战争和封锁，并没有难倒西北大后方兰州的大商贾，相反，他们的货源倒是愈“战”愈畅旺了。

兰州的战时繁荣也带来了其他的好处，电灯明亮了，抗战文艺也有了发展。薛迪畅告诉我们，兰州已有好几个剧团，常演出抗战的话剧。有一天他为我们弄来了几张戏票，我们去看了一场演出



——那时正好几个剧团在联合公演。不过我们没有“暴露身份”，因为尚有延安之行需保密。我们叮嘱薛迪畅不要把我们到达兰州的消息传出去。

我和仲实去拜访了西北公路局的沈局长。他见到我们十分欣喜，硬拉我们去饭馆为我们接风。他也风闻杜重远被盛世才关起来了，一直为我们两人的安全耽心，问我们如何从新疆脱身的。我们不便与他深谈，只好说，我们家里有事，请了假出来的，现在要去重庆，因飞机票难买，打算从陆路走，先到西安办点事，想请他帮忙买几张去西安的汽车票。他满口应诺，问我们哪天走，好为我们挑选一辆好车和预订几个好座位。他又打开了话匣子，大谈西兰公路，说这是目前西北最好的公路，平整、宽阔、坚实，上坡地段还铺了碎石，路面保护得好，旧式木轮大车一律禁止通行，等等；而在1938年，西兰公路还是有名的“稀烂公路”。也就是说，公路面貌的改观，是他沈局长上任后的“德政”。

隔了一天，他到招待所来找我们，说有个好机会，青海一位活佛要去重庆，因为买不到飞机票，省政府就指令西北公路局为他开一辆专车，经西安去重庆。“他们一行才四人，我就和他们商量，让你们搭这辆专车同行，那活佛已经同意了。”又说，我再给你们挑一辆新车，派一名老司机。仲实问，能不能再增加两个人，让生活书店的经理薛迪畅和一个职员搭车同行？他也一口答应了，说一辆车可坐二三十人，没有问题。

5月14日早晨，我们登上了去西安的“专车”。活佛就是喜饶嘉错，他带了一位秘书和二个随从，坐在车的前部。我们七个人还有公路局的两个职员占据了车的腹部；后面空着的座位就堆放行李。沈局长还专程赶到车站为我们送行。

从兰州到西安全程七百多公里，车行三天，每天发车四五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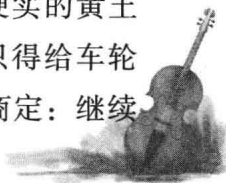
等。我们上路那天，除了我们的“专车”，还有四辆挤得满满的客车。开出兰州站，我们就一马当先，把其余四辆远远甩在后面，充分显示了“专车”的优越性；只是速度快，车身轻，不免有点颠簸。幸而沈局长的“德政”见了效，公路果然十分平展，加上车子是新的，司机又是老手，所以颠簸得不厉害。

下午三时许，我们的专车到达华家岭车站。在兰州出发时，天气颇热，我们都穿着单衣，可是华家岭上这时却阴云密布，寒气刺骨，不久疏疏地下起雨来。华家岭是第一天的“宿站”，客车都在这里过夜。然而我们的专车提前了两三小时到达，又不是普通客车，继续赶路抑或留宿，车中客人可以自定。司机耽心变天，主张赶路；喜饶嘉错的秘书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他们主张留宿，因为天已下雨，路上也许麻烦。我们也同意留宿。司机没办法只得服从我们。

黄昏时分，另外四辆客车陆续赶到，都停留下来。一百多客人把个华家岭招待所挤得满坑满谷。晚饭后，雨大起来了，睡在床上能听到檐溜声。第二天早起一看，糟了，一片银白，雪有半尺厚。人们在西兰公路行车最怕华家岭下雪，往往一场雪会造成三、五天，甚至七、八天封岭，司机不免抱怨起来，我们也后悔不迭。华家岭车站与招待所孤悬在岭上，离最近的村庄也有二十多里。五辆车上共一百多口，万一困在岭上七八天，总不能让客人饿肚子。于是，招待所一早就派人出发去采购粮菜去了。

雪终于停了，刮起了风。下午出去探路的人回来说，雪已消了一半。看看天色，仍旧阴云密布。大家耽心又要下雪，就动员司机发车。其余的司机都不肯，只有我们这辆专车的司机为了尊重车上的贵客，勉强同意了。

下午三时，我们的专车开出了华家岭车站。原来挺硬实的黄土路基，经过雨雪的浸泡，稀烂了，车轮开上去就打滑，只得给车轮带上铁链。爬过一个坡以后，天空又飘起了雪花。大家商定：继续



赶路，新车机件好，不怕，冲出风雪范围，到了岭下就好了。当地人说，往往岭上凄迷风雪，岭下却烈日炎炎——这就是华家岭的厉害。雪愈下愈大，带上链子的车轮也打滑了，车身经常像醉汉那样摇摆。时光已四点半，前面还有几个坡，司机宣布：不能前进了，要回转。看看路旁的里程碑，一个半小时才走了十公里。可是祸不单行，车子掉头的时候，不慎后轮滑到了路沟里，再也动弹不得。叫来了救援车也没能拉出来，只好先把我们这些贵客送回招待所。

这场大雪持续了一天一夜，有的客人已把皮袄翻出来作长期困守的打算。但第三天下午，太阳出来了。五月的雪经不住太阳晒，很快就融化了，只是道路更加泥泞了。有经验的旅客安慰新来的旅客道：“只要刮一天风，路就干燥了。”果然，天从人愿，下一天早上又出太阳又刮风。十一时许，我们那辆搁浅的专车开回来了。下午两点左右，五辆车先后开出了华家岭车站，当晚在静宁过夜。

第二天是翻越六盘山。六盘山虽险峻，道路却好，尽管拐了九曲十八弯，却并无麻烦。翻过山，汽车就加足马力在望不到边际的黄土高原上奔驰，扑入视野的是绿色的“麦浪”和远处一排、一簇傲然耸立的白杨树。在白杨树的附近，一般就有人烟，或一个小村庄，或三五户人家，他们围绕一口水井或一个死水塘生活。司机告诉我们，这里的水贵如油，除了天上落下来的，就是从百丈深的井里打上来，人们难得洗上一次脸。休息时，我们参观了几户人家，它使我想起曾经听到的传说：西北有些地方大姑娘穷得没有裤子穿。黄土高原是肥沃的，然而在它上面生息的人民却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

下午四时许，汽车开始下塬。无穷无际的高原突然被无数的深沟割裂了，截断了，公路沿深沟盘旋而下，似乎又进入了峻岭峡谷。



这时，我才更深刻地领略到了黄土高原的雄壮与伟大。当晚我们歇在平凉。

5月19日下午，我们的专车经过咸阳到达西安。我们从长途汽车站坐上人力车来到中国旅行社西京招待所时，时针已指着五点。我登记了两间房，把卡片交给侍役。这时有一穿长衫的职员走过来，板着面孔说，没有空房了，请到别处去吧。我觉得奇怪，偌大一个西京招待所就都住满了吗？为什么侍役刚才不知道？我转而向这位职员交涉，请他通融一下。正谈着，从经理室出来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人，西服革履，听到我们争论，就走过来，拿起我登记的卡片看了一眼，问道，哪一位是沈先生？请到里面来谈。我跟他走进经理室，他敬烟，请茶，十分热情。他问：听说沈先生在新疆，怎么到西安来了？我一听，明白他已认出我，就以实话相告：因私事离开新疆去重庆，路过西安，打算在这里玩几天。他说，这里的空房间不是没有，只因这几天住着两个团体，规定不让接待一般的散客。你们自然例外，刚才我们的人不认识沈先生，对您有失礼之处，请多包涵。这位先生就是西京招待所的经理，上海人，后来他还向我表示，他是我的作品的热心的读者。

我们把行李搬进房间，安置妥当，外面已暮色苍茫。头天晚上敌机炸坏了发电厂。今天尚未修复，这一晚西安市没有电灯。这次空袭，西安的繁华街道落弹数枚，造成了伤亡和损失，更引起市民的惊慌。我们在烛光下匆匆吃完晚饭。打算早点休息。侍役来劝告我们，九点前不要睡觉，这几天天天晚上有空袭。七点钟果然响起了警报，只听得门外一片嘈杂声，侍役推门进来叫我们快走，他要锁门。我们莫名其妙地跟着人群奔下楼，不知防空洞在哪里，只见院子里停着两辆卡车，人们争先恐后地往上爬，还有一些警察和宪兵在呼呼嚷嚷。张仲实爬上第一辆，车就开了；我们奔向第二辆，



刚把两个孩子推上去，车也开动了。德沚急得直叫，想让孩子们下来，但已来不及了。院子里还停着两三辆小轿车，其中一辆敞着门，里面的人似乎在招呼德沚。德沚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我就钻了进去，一看是个不相识的中年军人。我明白弄错了，但也顾不得许多，且追上两个孩子再说。这时一个挂盒子炮的勤务兵跑来向那军官报告，太太没找到，大概上另一辆车子走了。军官挥一下手说：快开车！汽车冲出招待所大门向城外开去，不久就穿过了城门。我心中纳闷：防空洞难道在城外？正想着，车在路旁停住了，军官下了车。我们挂念着孩子，也跟着下了车，见前方影影绰绰停着几辆车，就问司机，招待所的汽车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我们停车的地方，左边是一块高地，种着大麦，隐约能见人影在走动。我和德沚就爬上坡去找孩子，这才发现麦田里到处是人，真是太巧了，亚男和阿桑就坐在跟前的田埂上。

找到了孩子，我们心中落下了石头，就问孩子们同车的是些什么人。亚男说，是一些广东人，属于一个什么慰问团的车子也是他们的，招待所没有车。这些人每天晚上来这里躲警报，要到十点多钟方才回去。我站起来往车子开来的方向望去，见西安市在月光下像一大堆黑黝黝灰蒙蒙的烟雾，离这里并不远。我们找了个幽静的地方坐下，耐心地等着解除警报。夜气愈来愈凉了，敌机到底来不来，毫无征兆。离开招待所时太匆忙了，只有德沚临时抓了一件呢大衣，这时披在她和亚男的身上。

我想，再等下去，肯定会冻出病来，那就要打乱我们预定的计划。于是我站起来说：我们到公路上去活动活动身体，一面慢慢往城里走，这里离城不远，我们到城门外去等候解除警报。德沚止问：“不坐车啦？”“不坐了，这车本来不是为我们准备的。”

我们四人沿着公路往回走，渐渐地身子暖和了。我发现公路两旁的庄稼地里三三两两的，都是躲警报的人。大约走了半小时，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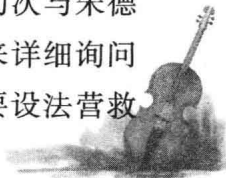


然路旁有人喊道：“紧急警报！谁在那里走动？快躲起来！”我们连忙服从命令，躲到路边坡上的一棵小树下。不久，似乎听到有飞机的嗡嗡声，又过了一会儿，附近有人轻声说：“飞机过去了，快解除警报了。”只见有人影往坡下移动。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了拉长的汽笛声——警报解除了！我们又回到公路上，一会儿成串的汽车亮着前灯从我们身边掠过。又走了一阵，公路上奇迹般地出现了兜生意的人力车，我们就坐上人力车回到了招待所，看表，已经十二点了。

后来我从经理那里知道，招待所里住的客人，一部分是第二战区所属的一个团体，另一部分是陈嘉庚率领的华侨慰劳团，那些警察和宪兵，就是负责保障华侨慰劳团的安全的。院子里的汽车是这两个团体的专用车，一般散客躲警报是到后院招待所专备的防空洞里。

第二天上午，张仲实去找熟人打听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以及如何与办事处联系等事。回来说，办事处的大门外经常有国民党便衣，有的青年在门口徘徊，往往被便衣请了去“谈话”。如果径直上前敲门，反倒容易进去，不过出来比较麻烦，便衣可能盯上。所以进去的人就要打算不再出来——直接去延安。我说，我们不是年轻人了，我们是去会朋友，总不致于不让会朋友罢。

当天下午，我和仲实就来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在客厅里意外地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恩来三月份从苏联回到了延安，他的右臂业已治愈，但留下了残疾，这次他又从延安出来，要到重庆去。总司令正相反，他是从山西前线来，原来准备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不去了，要回延安。我是初次与朱德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话语不多的敦厚的长者。恩来详细询问了我们离开新疆的经过，又问杜重远的情况。我们提出要设法营救



杜重远。他说，三月间他经过迪化回延安时，曾向盛世才提出让杜重远搭他的飞机回内地治病，盛世才没有同意，推托飞机已经满员，说是让杜搭下一班便机走；现在你们回来了，杜先生仍未走成，可见盛世才不想让他回内地。这件事只好慢慢再想办法。恩来又问我们今后有何打算，我们说想去延安。恩来当即表示欢迎，说，你们不论是去参观还是去工作，我们都欢迎。正巧有个好机会，总司令过几天要回延安，你们可以同他一道走，这样路上的安全也有了保证。他还说现在去延安不像三七、三八年那样容易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沿途设下重重关卡，随便抓人。如今我们采取了分批护送的办法，即在八路军办事处集中了一批去延安的青年之后，由办事处派人用汽车送进边区。去的青年都换上军装，充作八路军的人员，但即使这样，仍发生过多起国民党特务机关截留卡车的事件。不过，你们这次搭总司令的车队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是不敢留难的。

我们请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讲讲抗战的形势。他们介绍了一年来的敌我形势的变化，敌军的进攻和“扫荡”，根据地的扩大和胜利，以及国民党愈演愈烈的反共内战政策。讲到前不久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大举进犯八路军，被我军一举歼灭了朱怀冰的三个师，恩来说：总司令原来要去重庆就为了这件事；现在总司令不去了，我代他去谈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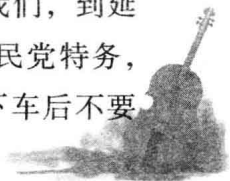
我们请恩来和朱老总进去休息，就向办事处主任了解去延安的准备。主任说，你们先搬到办事处来，走前再换装。他问我们住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我们到了西安。仲实说有两个朋友知道，但已叮嘱他们不要外传。他又问国民党方面知不知道？这时我忽然想起了西京招待所经理，就告诉主任，在西京招待所我被人认出来了。主任想了一想道：那么你们先不急搬来，免得打草惊蛇。总司令是24日走，你们23日下午来，雇几辆人力车，直接拉到大门口，我派



人在门口接你们。仲实认为 he 可以先搬到办事处来，一则那位经理不认识他，二则分批来也能缩小目标。主任认为也可以，于是决定第二天晚上仲实就搬去，我们一家人则坚持到 23 日下午。我们起身告辞，主任却留我们吃了晚饭再走，说天黑以后大门口的便衣就回家了，那时派人送我们出去。

西安有个碑林，久已闻名，据说那里保存了汉魏以来的各种石碑一千几百方，历代著名书法家的碑石大都集中在这里。第二天上午，我们与仲实同去碑林观赏了一番，回来路过民众市场，又进去转了一圈。西安的民众市场是远近闻名的，可以说是西安市的一个缩影，除了现代化的工厂，里面几乎应有尽有——包括秘密的大烟馆和公开的“人肉市场”。晚上，我们送走了仲实，又隔了两天，我们全家也搬进了八路军办事处。

5 月 24 日上午八时，总司令的车队开出了西安城。车队有三辆卡车，共四五十人，除了朱老总和夫人康克清及其随行人员，其余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和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其中我见到了龚澎。他们都穿了军装，充作朱老总的随从。亚男和阿桑也换上了军装，并且起了个假名。我和德沚、仲实仍旧穿便服，这是头天晚上决定的，因为我们算作知名人士，可以冠冕堂皇地去延安参观；如果换了装，改了名，被认了出来，反倒不好解释，况且我们穿上军装也不像个随从。朱老总乘第一辆车，他坐在司机旁边；我们在第三辆车上，驾驶室的座位则优待了德沚。我们五个人临时编成一个小组，派了一位从武汉来的大学生——名叫陈绪宗——担任我们的组长，这位组长的任务，就是一路上照料我们。他为我们坐在卡车的前部用铺盖垒了两个舒适的软座，还随身提着一个热水瓶。他告诉我们，到延安要走三天，第一天在国民党地区过夜，那里布满了国民党特务，行动稍一不慎，就有被绑架的危险。他特别警告阿桑，下车后不要



乱走，不要看热闹。曾有去延安的青年，走到街上，一个特务故意撞他一下，反而诬告他打人，就被预先等在旁边的宪兵抓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交涉抗议都没有用，而汽车又不能因他一人滞留下来。他说，吃饭住宿一切由他来安排，我们有什么活动也要告诉他。他又考问了阿桑是否记得那个假名字，叮嘱阿桑记牢，万一国民党的宪兵照花名册来点名，要准确回答。

傍晚，我们在铜川的一家旅店歇宿。朱老总住在附近另一片旅店里，晚饭后他特地过来看望我们。闲谈中，我发现这位名震中外的将军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与我们侃侃而谈的话题是杜甫和自居易。他提议明日经过黄陵时，上去拜谒一番。

那个晚上，我们听从组长的吩咐，没有迈出旅店大门一步。可是临近子夜，一群国民党宪兵却找上门来，声称奉命搜查一名可疑分子。陈绪宗当即把他们拦在门外，并大声和他们争吵起来。一会儿负责护送我们车队的副官同志闻讯赶来了，他亮出总司令的通行证，坚决拒绝宪兵的无理要求。双方各不相让。后来国民党方面来了个军官，说是误会了，请我们的副官到他们的司令部去谈谈，那群宪兵才跟着溜走了。

次日午后一时许，我们的车队停在桥山脚下，大家拾级而上，来到黄陵前。入口处有一牌坊，上书“轩辕黄帝陵”五个大字，并有卫兵守卫。那卫兵见有大群人上来，忙来拦阻，说是奉上司命令，此乃国防重地，不准参观。我们的押车副官就去找他的上司交涉。原来国民党在30年代曾将黄陵修葺一新，每年派大员来祭扫，并专门成立了个黄陵管理处，卫兵就是管理处派的。那管理处负责人见是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来谒陵，也就特别通融，亲自陪我们登上陵墓，还作了介绍。整个陵墓古朴雄伟又带点凄凉。迎面一个巨大的土冢，冢前有一平台（据传这是汉武帝所筑的祈仙台），台前立一大石碑，陵的两旁也立有若干石碑，上面刻的则是祭文。陵墓周围的



山坡上是冲天的古柏，有数百株，都是千年古柏。管理处的人说，他们的任务实际上就是防止周围的农民来偷伐古柏。至于国民党当年修葺的痕迹，已残留不多了。

我们在陵前留了影（这也是特别通融的），总司令点名要我来讲讲黄帝的故事。我推辞不了，也就书生气十足地讲了一通黄帝的“家史”。我说，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姓姬，号轩辕氏，相传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用现代的话说，大概是中国氏族社会最早的各部落公认的首领。黄帝既有武功又擅文治，他先打败了炎帝，后又击杀蚩尤于涿鹿之野。在他治下有许多发明创造，他手下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他的妻子嫫祖发明了养蚕和缫丝，他又与一个叫歧伯的医生编了第一部医书《内经》……等等。当然这些都是传说，或者是神话，但这些神话传说在人们口头传诵了五千余年，正说明了黄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他代表了我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我讲完之后，总司令接着讲了话，他很幽默地说，刚才沈先生讲了历史上的黄帝，现在我再讲一讲当代的黄帝——我们这些黄帝的裔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光辉的历史，然而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却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百般欺凌，被称作“东亚病夫”。现在，这个古老的民族觉醒了，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烽火，全国人民正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战争。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也一定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有人想阻挠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想妥协投降，这种人是黄帝的不肖子孙！总司令的话不长，却极富煽动力。我才发现总司令还有很好的演说才能。

当天下午四时左右，汽车经过最后一道国民党关卡进入了陕甘宁边区。我们稍事休息，青年们都跳下车去，兴奋地跳着、笑着、唱着，尽情倾泄他们第一次踏上自由的土地的欢乐感情。晚上我们在酃县招待所休息，第二天一早，车队向延安进发。



5月26日午后，我们经过劳山，二时许抵达延安南郊的七里铺。我们这辆车比总司令的车迟到了二十分钟，我们到达时，总司令的车以及到七里铺来欢迎的人群已进城去了，公路旁还停着两辆小轿车，周围站着五六个人。我爬下卡车，只见德沚正向一位穿灰军装、戴眼镜的高个子奔去，一面兴奋地喊：“闻天！闻天！”我也看清楚了，原来是张闻天，七、八年不见，还是老样子。我们紧紧握手，互相问候。这时，一位身材瘦小的同志走上前来，用上海口音问道：沈先生还记得我吗？我仔细端详，只觉得面熟，却记不起名字，就说，好像见过面。他哈哈笑道：我就是虹口分店的廖陈云。他一说，我也就认出来了。1925年商务印书馆大罢工时，我们常见面，那时他很年轻；后来他被派往苏联学习，就再未见过面，算起来已有十四年了。他们请我和仲实、德沚换乘小汽车进城。到了南门外，又有各机关学校的代表在路旁欢迎，其中有不少在上海就认识的熟面孔，在人群中我和德沚也见到了琴秋。

我们被送到南门外的交际处休息，接着又被请去参加欢迎宴会。这是近百人的大宴会，菜肴虽无山珍海味，却也鲜美可口，更为突出的是宴会的气氛不同一般，大家无拘无束，笑语满堂。就在这里，我尝到了延安的名菜“三不粘”——一种用鸡蛋做的甜菜。

傍晚，我们参加了延安各界在南门外操场上举行的欢迎会。这次欢迎会是临时决定举行的，因为各机关学校的群众听说朱总司令回延安来了，都自动整队来到了南门外。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热烈而又质朴的场面：台上挂着两盏汽灯，把简陋的黄土垒成的主席台照得通明，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秩序井然地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他们互相拉着号子，此起彼伏地“比赛”唱歌，有我熟悉的《大刀进行曲》和《游击队之歌》，也有我第一次听到的《八路军进行曲》。来参加大会的中央负责同志都坐在台下第一排的小马扎上，我们也坐在那里。欢迎会主要是请朱总司令讲话，他的讲话不断被热



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打断。朱总司令离别延安已经两年，此次归来，又值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在山西挑起的磨擦之后，自然群情分外激昂。

第二天晚上，延安各界又在中央大礼堂开欢迎晚会，毛泽东同志也来了。当他穿过观众席之间的通道来到前排时，被群众发现了，大家向他鼓掌。他举手向群众致意，然后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又和我们一起坐在第一排的长凳上。礼堂约能容纳六七百人，座位是固定在本桩上的长条木板；舞台却大，那天鲁艺演出了《黄河大合唱》，舞台上站了二百多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使我大开眼界，使我感动，使我这个音乐的门外汉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就像灵魂洗过一次澡似的。我到延安时，冼星海刚刚离开，没有见到他，但我从《黄河大合唱》这一组歌中认识了这位天才的音乐家。

在交际处，我和仲实各住一孔窑洞，亲身体验了窑洞的风味。早餐，我们又尝到了延安的小米粥，这是在上海难得吃到的；但儿子不喜欢吃。我对两个孩子说：你们不但要习惯于喝小米粥，还要习惯于吃小米饭，因为我们将长住延安，而你们将进抗大或其他学校学习。第二天琴秋就来看望我们，她是女子大学的教育长，她建议亚男去女子大学，阿桑进毛泽东青干校。女大是新创办的学校，专门培养女青年，这对亚男很合适。让阿桑进青干校是考虑到他身体太弱，进抗大不适宜。但是儿子不愿去青干校，要去陕北公学，因为他从《西行漫记》上只知道有个“陕公”，却不知有“青干校”。琴秋解释道：青干校学生的来源比较单纯，都是像阿桑那样的学生，而陕公则庞杂。然而儿子不听，只得让他进陕公。

闻天也在第二天到交际处来看望我们。隔了一天我到杨家岭作了回拜。我们除了叙旧，还谈了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情形。他问我今后的打算，我说，准备在延安长住下去，有机会想到前方看看。

